

我与大公报

《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》编委会 编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与大公报/《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》编委会编.
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2.5
(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)
ISBN 7-309-03204-7

I. 我… II. 大… III. 大公报-回忆录 IV. G219.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0786 号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

86-21-65118853(发行部) 86-21-65642892(编辑部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14.75 插页 2

字数 383 千

版次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PDG

丛书总序

《大公报》于 1902 年创刊,至 2002 年 6 月 17 日,满一百年。

际此一百周年华诞,《大公报》香港馆编撰出版《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》,为小小的献礼。

丛书共 10 册:

《大公报一百年》、《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》、《大公报一百年头条新闻选》、《大公报一百年副刊文粹》、《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》、《大公报环球特写选》、《大公报人物》、《我与大公报》、《大公报特约专家文选》、《大公报小故事》。

我们试图通过丛书 10 册的不同角度,回顾《大公报》一百年历程。丛书既记载《大公报》一百年历史,又通过一百年《大公报》版面上的重要新闻报道及评论,以及部分名家作品,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、中国的变化、香港的变化。

历史长河风云变幻,《大公报》的百年历程迭宕起伏。漫漫一百年,《大公报》有过迷惑的时期,经历过矛盾的阶段,但从总方向来说,《大公报》始终坚持爱国,坚持民族大义,在国家盛衰兴亡的紧要关头,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。《大公报》的历史命运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。《大公报》百年史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,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

我 与 大 公 报
TA KUNG PAO

辛历程,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。在历史上,这份报纸发挥了积极作用,并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,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;在国运兴隆、国势兴旺的今天,这份报纸充满新的活力,与全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一道并肩前进。

丛书 10 册,也试图在这些方面作探讨。

老一辈《大公报》人殚精竭虑、寝馈其中,使《大公报》有辉煌的过去。让我们藉这套丛书向他们表示敬意。

自 1948 年港版复刊,港馆员工薪火相传、锲而不舍,在内地和海外的 20 多个办事处、记者站的同人也不断开拓、努力进取,使《大公报》今天能继续焕发青春、与时俱进。特别是《大公报》2001 年获香港新闻最高荣誉奖——2000 年新闻大奖及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,这是对百年报庆的献礼。也让我们藉这套丛书向为香港回归祖国和落实“一国两制”而奋斗的报社员工致敬意。

一百年太长。丛书虽分 10 册,字数 300 余万,仍必然会挂一漏万,种种谬误粗疏之处,敬希前辈、同业、各方友好原谅、指正。

《大公报》社长 王国华

2002 年 6 月

目 录

第一辑：忆旧怀远

杨刚与百姓同在	陈 朴
香港《大公报》忆旧	唐振常
我和萧乾在《大公报》的日子	王文彬
我考入桂林《大公报》为练习生的回忆	黄克夫
抗战六年在桂林	王文彬
我与《大公报》	陈海容
回首起步“学与教”	吕少群
我和《大公报》	徐 真
五十年前的实习生涯	郑介初
我与《大公报》	叶国珍
为《大公报》自豪	石 坚
我与《大公报》	
——二十年与《大公报》的因缘	董鼎山
我与《大公报》	孔岳文
大公报情缘	彭 龄
忆昔“闻”识《大公报》	陈 宇

我 与 大 公 报
TA KUNG PAO

- 我与《大公报》三十年 陈左高
君子之交
- 我与《大公报》的交往 舒 展
一脉文心终有渡 叶文玲
既是良师 又是益友
- 兼忆报道唐涤生猝死 子 楨
我与《大公报》副刊 徐志啸
四十二年从头说 杨祖坤
- 《大公报》——我的启蒙课本 黄 钟
一方满意 一方满足
- 忆陈彬率团访吉林 张明友
此时此地十年见证 黄非红
- 我与《大公报》五十余载的文缘 马国权
梁羽生二三事 杨晓风
走向社会的第一课
- 忆《大公报》实习对我一生的影响 林 放
我与《大公报》 雷穆扬
与《大公报》结伴而行 温光贻
忆旧怀远大公缘 黎小燕
《大公报》扫除“瘟疫” 宛若奇
- 我与《大公报》五十年 罗 琅
大洋彼岸的祝福 姚 船
白山黑水间的“大公热” 邵 干
不尽感念话故人
- 费彝民先生对我一生的影响 计泓赓
敬业爱社同此情 王叶田
在《大公报》学做翻译 黄灿然

难忘岁月	万民光
《大公报》子弟醉书香	高 洁
一生的遗憾	徐城北
南海采油美梦成真	王 健
经久不衰的友谊	
——为纪念《大公报》100周年而作	田 森
忆费公	陈可焜
交谈如水	
——我与《大公报》	刘荒田
我和《大公报》的点滴回忆	刘 诚
四代师恩情	陈庆钱
几件难忘的小事	陈伟球
特约记者十年间 胜似研读二十载	
——“我与《大公报》”往事感怀	简瑞年
往事知多少	
——贺《大公报》百年庆	蔡柏生
《大公报》和我	黄 霏

第二辑：大公春秋

“大公报号”滑翔机	
——记《大公报》倡导中国滑翔运动始末	王芝琛
胡适·《大公报》·白话文	王芝琛
《落日》光华垂翰墨	
——怀念朱启平先生	张成觉
认识一个真实的萧乾	邵燕祥
大公篮球队	王芝琛

我 与 大 公 报
TA KUNG PAO

抗日烽火中诞生的“大公剧团”	王芝琛
王芸生参加人民政协一次全体会议前后	王 鹏
杂谈《大公报》	张颂甲
话当年《大公报》连载《三毛流浪记》	王芝琛
浅谈张季鸾先生	王芝琛
英敛之创办《大公报》	王 鹏
吴胡张续办《大公报》	王 鹏
国闻通讯社·《国闻周报》·《大公报》	王 鹏
由顾准的一封信想到王芸生	谢 泳
《大公报》派记者到苏联采访	王 鹏
《大公报》在重庆的岁月	伍江川
悼际垆	黄 裳
胡适与《大公报》	谢 泳
《大公报》的“三驾马车”	智效民
且说吕碧城与英敛之	高增德
《大公报》的“四不主义”	王 鹏
《大公报》的“社评委员会”	王 鹏
《大公报》保存经过	吴 葆
《大公报》的“星期论文”	王 鹏
报纸“捧星”首开先河	王 鹏
新记《大公报》的“开国五虎大将”	王 鹏
长江精神	张建星
张季鸾撰文评蒋介石	王 鹏
三十年代的《大公报》副刊	贾晓慧
陈君葆与《大公报》	陈云玉
《大公报》记者采访罗斯福总统与夫人	王芝琛

“中间势力”——敌耶？友耶？	
——读《百年沧桑》的随记	舒 展
张季鸾与于右任	牛 济
剪辫易服,居功至伟	侯 杰
《大公报》与天津阅报社	侯 杰 樊爱香
《大公报》的老广告	由国庆
《大公报》“电影”广告与中国第一家影院	王兆祥
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的《大公报》	王 鹏
《大公报》的晚报	王 鹏
赣行采访	
——《大公报》记者王芸生给蒋介石授课	王芝琛
北京《大公报》的停刊	吴 葆
《大公报》与燕京学子情	林 放
《大公报》的西北情结	贾晓慧
“不打不成交”	王 鹏
张季鸾与文人论政	曾敏之
毛泽东会见《大公报》记者	王 鹏
香港《大公报》创办和发展	王 鹏
《大公报》的国内外特派员	王 鹏
早期《大公报》种种	王 鹏
赈济陕灾“宣传周”	王 鹏
编后语	

忆 旧 怀 远

■ 陈 朴

杨刚与百姓同在

为了给长辈扫墓,到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去。这是京城老百姓的墓地。这几年,公墓也在开拓创新:山顶盖起了办公楼,零乱的墓穴作了整理,修筑了通向各墓区的通道……

就在崭新的办公楼一侧的路边,我忽然发现一块高约 4 尺的墓碑,上面刻着“杨刚同志之墓”,墓旁围了一圈瘦小的柏树。看来这座墓原是淹没在拥挤的墓群之间,随着通道的开辟,就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了。墓紧挨着路边,不留余地,墓碑更显得引人注目。

看到墓碑,我不禁惊讶:杨刚的墓怎么会在这里?凭我的想像,以她的党龄,她曾经担任的职务,她的贡献,当然,她的墓应该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共和国奠基人的陵园里面。(注)

1946 年,我进上海《大公报》馆工作时,杨刚是报馆的驻美特派员,虽闻大名而从未得见,只是读到她从美国发回的一篇篇通讯。直到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,周恩来派杨刚同王芸生一起随军南下,到上海主持解放后的《大公报》,这才见到了她。她一点没有在美国居留过的那种女性的味道,一身灰布列宁装,伏案工作时不停吸着烟卷,言谈举止比男子更有男子气。她的豪爽正直,言论精辟,待人诚挚,很快在原来并不熟识的同事中博得好评。不久,上海《大公报》发表《新生宣言》,宣告《大公报》属于人民。杨刚完成

任务后即回北方工作。后来听说她在外交部当了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秘书；抗美援朝开始后，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，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开城谈判的工作；后又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、《人民日报》社负责国际宣传的副总编辑，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。正在为她庆幸时，不幸的消息接连传来：1955年秋，她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中遭遇车祸，造成严重脑震荡，留下头痛难忍的后遗症。1957年秋，她偶然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，而当时正在反右的政治风暴中，这使她紧张万分，终于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眠不起，终年51岁。从此就听不到有关她的音讯了。

27年之后，1984年，萧乾选编的《杨刚文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使怀念杨刚的亲友、同志感到莫大宽慰。读了杨刚的作品和附录的纪念文章及年谱，才知道了更多有关她的情况。她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，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。在校期间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，备受酷刑，坚贞不屈，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文化工作。她不仅当过《大公报》记者、文艺副刊主编，还是早在30年代就开始发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的作家，又是北方“左联”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。胡乔木为《杨刚文集》写的序言对杨刚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，认为单是她的散文集《沸腾的梦》，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。她还是世界文学名著《傲慢与偏见》（英国作家简·奥斯汀的长篇小说）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，并兼任过岭南大学教授，讲授过“翻译研究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她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，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，还为党做过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。她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，“有男人而不能做男人的妻子，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”。丈夫分手后牺牲于日机轰炸，

幼小的独生女儿送往延安,自己长期过着没有家庭的生活。建国以后,她仍然独身一人,忘我工作,不分昼夜。周恩来非常器重她,曾对毛泽东说杨刚是党内少有的女干部。

这部《杨刚文集》出版时,扉页影印着邓颖超 1983 年 9 月的题词:“《杨刚文集》出版,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优秀女儿——杨刚同志的最好的纪念。”

现在我看到,邓颖超的题词竟被刻在杨刚墓碑的上端,像是一个文件的批示。我不知道原来安葬时有什么样的墓碑,而这块墓碑是 1987 年 1 月重立的,离杨刚逝世已达 30 年之久。

凡是上了一点年纪、经历过过去年代的人都会理解:为什么逝世后该进革命干部陵园而没有进去;为什么安葬时未能及时立一块恰如其分的墓碑,而在重立碑石时还要刻上领导人的题词。据说,杨刚生前“没有受过任何责怪”,当然更谈不到受什么处分了。仅仅由于她逝世的特殊情况,本来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都成为不可能了,甚至连称呼一声“同志”也成为问题了。显然,有了邓颖超题词的评语,杨刚的一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,这不仅足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,而且就有理由大书“杨刚同志之墓”。在不算短暂的 30 年间,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不受处分而有处分待遇、不称平反而得平反之实的过程。但尽管如此,这位忠诚的革命家还是被摒于革命公墓的陵园之外。

正如墓碑碑阴镌刻的杨刚的两位外孙署名的铭文:“姥姥永远和人民在一起”,杨刚一生热爱人民,无私奉献,她安息于人民公墓,身处平民百姓之间,也许更符合她的夙愿罢!

(原载 1999 年 1 月 26 日《大公园》)

我 与 大 公 报
TA KUNG PAO

注: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八宝山南麓,除殡仪礼堂外,设有革命干部陵园,骨灰堂;人民公墓在八宝山北坡,除办公楼外,是一片墓地。

■ 唐振常

香港《大公报》忆旧

此番在港,居留时间超过以往十几年间的每一次,也就多了一些时间遐想,感岁月之易逝,念旧友之凋零,为此文以记 51 年前初到香港的往事。

那是 1948 年 10 月,我在上海《大公报》做记者,香港《大公报》已经复刊数月之后,忽一日,费公彝民(时任香港《大公报》经理兼上海《大公报》副经理,经常往来港沪间)对我说:“你已经列名黑名单,赶快想法走。”费公并告,他是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那里知道的,消息确实。这自然引起我考虑。早在 1947 年 7 月,上海“文萃”案发,我的朋友,后称为“文萃三烈士”者陈子涛、骆何民、吴承德被捕,我也因此而被中统局逮捕,拘留一夜,经《大公报》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电话上海市长吴国桢力救得出。在上海,我有再被捕的可能。其时,我在上海的朋友黎澍、孟秋江、唐海等,还有我的胞弟唐君放都已到了香港,那时候,我们把香港看作自由的地方。事实上也是如此,左派人士在内地有了政治危险,一到香港就海阔任鱼跃了。

《大公报》素有一个传统,对于同人之被捕者总是尽力营救,前举王芸生先生之力救我,只是一例。当王先生打电话给吴国桢时,吴说:“我刚从南京回来,明天再说吧。”事实确是这样,吴国桢赴南

京公干,当晚回来,我和《新闻报》记者严洵、张孝权(现易名文达)、商报记者夏治淦三人相约夜访吴国桢,而我未及出发就为中统特务“请”走了。王先生毅然告吴国桢曰:“今晚不放人,我明天就登报。”这句话起了作用,我在亚尔培路二号中统上海办事处(今名陕西北路。这幢房子拆除了。真不该拆,多少人在这里被关押过,是历史的纪念。)被问了一番话之后,由一个特务用车送我到了吴国桢公馆。甫下车,严、张、夏三位正在扣门,我和他们是如约汇合了。1947年重庆《大公报》有记者曾敏之等多人被捕,尽管胡政之先生曾表示“爱莫能助”,遭同人不满,王芸生先生则以个人名义表示对捕人的抗议。及后,《大公报》驻广州记者陈凡被捕,胡政之先生营救不遗余力,亦足以补前失。《大公报》此种做法,颇有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遗风余韵,蔡元培主张学生的天职是读书,不赞成罢课、示威游行之类,而学生因参加爱国运动被捕了,他必竭尽全力救援,不达目的不止。

我向王芸生先生提出去香港《大公报》工作,顺利快速地达到目的。代买飞机票的同事设想周到,说是如飞香港,可能引起怀疑而追查,不如飞广州稳妥。于是,我在1948年10月的一天,由上海飞抵广州。抵广州机场,当时尚未谋面的《大公报》广州办事处记者黄克夫,径入机场,在飞机下客之时,冒叫一声我的名字,见面了。住广州一夜,翌日傍晚,再飞香港。几位朋友和我弟弟在启德机场接我,踏上香港土地,一颗心落地,不会有什么中统、军统来找麻烦了。

香港《大公报》在中环利源东街,是租用《新生晚报》的房子。无所谓编辑部和经理部,就那么一间楼上临街房子,白天是编辑部的日班人员和经理部办公,夜间则编辑、译电、校对、资料人员换

防,有时还要加上夜晚归来写稿的记者,室内无转身之地,一张桌子几个人用,没有一个人有独用的写字台,包括总编辑和经理。台上抽屉装的物件,也分不清是谁的。排字房、印刷厂在楼下,也是租用《新生晚报》的。这种窘迫之状,我倒并不吃惊。在入上海《大公报》之前,我曾经在成都一家报纸工作,那才算是最穷的报纸。其名为《华西晚报》,八开小报一张,如今国内即使是藏书藏报最齐备的图书馆,恐怕也不会找到这张报纸。抗日战争时期,这张报纸可威风得很,革命性可强得惊人,共产党党报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不敢登的新闻,《华西晚报》敢登。《华西晚报》从总编辑到记者、校对,工资一律,它是最早实行平均主义的机构,可谓继太平天国之正统;工资数目,有同于无,大约只够买几包香烟。这真是“越穷越革命”。办公地方,起初借用一个学校,后来搬到一家赌场,在赌客喝五呼六声中干革命,旷古所未闻。有此经历,到了利源东街的《大公报》,我视之晏如也。起码工资有保障,一日三餐,供应饭食亦不恶,深夜编完报回去,的士送归。这在昔日《华西晚报》,均不可想像。《华西晚报》全报社人员,都是安步当车,除了一位记者有一部破烂的自行车。在香港《大公报》数月间,我和多数同人一样,感觉可以自由痛快地说话编报,不需再做违心的事了。工作条件虽差于分别来自上海、天津、重庆的《大公报》三馆,而工作环境完全变了。这段时期的香港《大公报》,便成虎虎然有生气。

到差之初,陈凡调往广州,任办事处主任,我接他的班,编本市版,这里称作港闻版。对于这个版面,我实在很乏味。充斥版面的新闻,无非是肛门藏金走私被查获,抢劫案等等,而其文字,粤语加似通非通的文言,令人难解。是以,我曾自嘲曰:“港闻版编得最好的一栏是‘今日广播’。”那时还没有电视,只有一个“丽的呼声”电